

学苑文丛

中华文学史料

第二辑

中华文学史料学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主编◎刘跃进



学苑出版社



ISBN 978-7-5077-2958-0



9 787507 729580 >

定价：60.00元

中华文学史料

第二辑

中华文学史料学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刘跃进 主编

学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华文学史料: 中华文学史科学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第2辑/刘跃进主编. —北京: 学苑出版社, 2007.9
ISBN 978-7-5077-2958-0

I. 中… II. 刘… III. 文学史—史科学—中国—文集
IV. I209-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49373 号

责任编辑: 战葆红

出版发行: 学苑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丰台区南方花园 2 号院 1 号楼 100079

网 址: www.book001.com

电子信箱: xueyuanyg@sina.com

xueyuan@public.bta.net.cn

销售电话: 010-67674055, 67675512, 67678944

印 刷 厂: 北京通州京华印刷制版厂

开本尺寸: 787 × 1092 1/16

印 张: 25.5

字 数: 500 千字

版 次: 2007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100 册

定 价: 60.00 元

引言

陈漱渝

中华文学史料学学会与四川宜宾学院联合举办的中华文学史料学学术研讨会于2005年4月在风景秀丽的西南重镇宜宾市成功举办。我作为学会最早的成员之一,受刘跃进先生委托,在会议论文集出版之际讲几句话。

我还清晰地记得,20年前,也就是1985年初,《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第1期刊登了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副所长马良春的一篇文章:《关于建立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的建议》。从那时开始,马先生开始跟有关同行酝酿成立一个研究文学史料的学术团体。1988年10月,在上海社科院文学所的支持配合下,召开了一次两岸三地的筹备会议。与会者积极性很高,书写了一段至今难以忘怀的历史。学会于1989年9月2日宣布成立,其宗旨是宏扬中华文学史料学的优良传统,论证史料学的科学性、应用性和现代化,联系海内外文学史料工作者开展中国文学史料的收集、考证、整理与研究。不幸的是,学会刚刚宣布成立,作为学会发起人之一的马良春先生即英年早逝。1991年11月,中华文学史料学学会在北京召开年会,推举贾植芳教授为新一任会长,并产生了52名理事。此后由于种种原因,学会会刊《中华文学史料》停刊,取而代之的是在山东《作家报》上开辟的史料研究专栏,但后来报纸发生生存危机,这个一度活跃的专栏也被迫陷于停顿。在我的记忆中,学会除1998年在徐州开过一次学术研讨会之外,活动基本处于停顿状态。2004年年初,学会换届,选出了新的领导班子,聘请了一批德高望重的老专家作为顾问。而后,在风光秀丽、人杰地灵的宜宾召开这样一次盛会,显示了学会重新恢复的活力与生机。今后,学会仍然需要同各高校和相关科研机构的同行精诚合作,使这样的学术活动得以持续开展,使文学史料学的学术品格不断得以提升。

大家知道,中华民族历来是一个重视史料积累和文化积淀的民族。在西周时期成书的《周易》就保存了中国早期的歌谣资料,显示出口传史料向文字史料的转型。从春秋时期至汉代,我国又产生了《诗经》、《论语》、《吕氏春秋》、《楚辞》等经典名著。

正是在《论语》这部影响深远的著作中,孔子最早也最鲜明地提出了叙述历史要以史料为依据的观点——“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论语·八佾》)。然而,跟浩如烟海的文学史料比较起来,作为专门学科的史料学研究却严重滞后。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特别是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文学史料学的理论建设和史料的辑佚、校注、考订、编纂等方面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我认为,最引人注目的有以下几项:

(一)1979年12月,中国社科院文学所主持编辑的大型资料《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正式起动,得到了全国24所高校和文学研究单位的支持配合。

(二)1981年9月1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年底,国务院作出决定,恢复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1983年11月,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召开首次会议,由此前成立的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主持。

(三)1985年至1987年,在全国范围开展了民间文学普查工作。蒙古族英雄史诗《江格尔》、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等少数民族文学史料得到了及时抢救。

(四)一大批重大学术成果问世,如以庚辰本为底本校注的《红楼梦》,以1998年版《鲁迅全集》为基础的2001年版《鲁迅全集》均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先后出版。这些经典作品的重印,体现了文学史料研究的最新成果。

(五)把现代科技手段引入文学史料研究领域,《论语》、《红楼梦》、《鲁迅全集》检索系统先后问世。

20世纪80年代之后,文学史料整理和研究工作相对沉寂,重理论轻史料的倾向抬头。有些史料研究成果不仅难于出版,而且在学位和职称评定过程中不受重视,这些都挫伤了一部分史料研究者的积极性。我们高兴地看到,这种学术偏见近年来开始得到纠正。2003年,清华大学召开了“中国现代文学文献研究座谈会”。2004年10月,河南大学、洛阳师院又联合《文学评论》编辑部召开了以“史料的新发现与文学史的再审视”为题的中国现代文学文献问题学术研讨会,强调论从史出,提出史料收集整理是研究的先导,呼吁通过文献的收集整理寻求研究的新突破口,带动整个学科的发展。2005年的宜宾会议进一步促使学术界克服对史料工作的偏见,真正认识到史料的整理和研究是提高学科理论水平的坚实基础和有效途径。为此,媒体称2005年

为“文学研究史料年”(参见祝晓风《2005,见证文学研究“史料年”》一文,《中华读书报》2005年11月9日头版)。

在看到成绩和进步的同时,我们又不能忽视当前史料工作面临的新情况和新问题。首先史料的挖掘整理工作做得不够。比如在清代文坛影响深远的桐城派,前后师承的作家1200余人,作品2000余种,但我们研究整理的仅限于几位大家。史料的征集和保存工作任务艰巨。从事古典文献研究的学者都知道,自鸦片战争之后,我国历史文献被列强大量掠走。比如甲骨文出土15万片,就被外国掠走了近3万片,敦煌文书被掠情况则更为严重。俄、日、法、英、美的所谓考古家从藏经洞掠走的文书至少有几万卷。目前财教部已拨上亿专款征集海外流失文物,但难度很大。近来又从国家图书馆传来令人忧虑的消息,即民国文献面临灾难性毁灭。一般来说,普通报纸的保存寿命只有50年至100年,图书保存寿命为100年至200年。由于民国文献所用的纸张酸性强,再加上缺少避光防尘、恒温恒湿的保存条件,该馆民国文献受损严重,其中中度以上破损比例达90%以上,民国初年文献已100%破损,无法提供阅览。与此同时,原有的文学史料有些需要重新考辨,如收入《革命烈士诗钞》的《我的自白书》长期被视为烈士陈然的作品,实际上有两行是《红岩》作者罗广斌的创作,其余十行是《红岩》的另一作者杨益言之兄杨本泉的手笔,跟陈然毫无关系。

以上种种情况都表明,考辨史料真伪是史科学的一个重要方面。作为一个史料研究者,一方面要“征求异说,采摭群言”,另一方面又要辨伪辟谬,存真求实。在我国的历史长河中,泥沙俱下、鱼龙混杂,伪造的实物史料、文字史料、口碑史料屡见不鲜。《汉书·艺文志》对伪书注明“依托”、“似依托”字样。隋僧法经著《众经目录》,别立“疑伪”一门。唐李德裕作《大和辨谤略》,旨在为周至唐遭受谗谤的忠臣贤士辨诬,惜此书今佚。宋人疑古最勇,司马光对《孟子》、欧阳修对《易·十翼》、朱熹对《周礼》、郑樵对《诗序》都提出了疑点,开后世辨伪学先河。清乾嘉时代中国辨伪学进入了鼎盛时期。五四运动之后,中国也曾出现“古史辨学派”。在新时期针对新情况应该将这一传统发扬光大。史科学研究在当下并不是英雄无用武之地,而是大有用武之地。

文学史科学研究不仅涉及技术层面的问题,而且必将涉及观念层面和道德层面的问题。唐代史学家刘知几(661—721)在他的名著《史通》中,提出了“史才”“史学”“史识”的概念。据我理解,所谓“史才”是指编选材料的能力和叙述史料的技巧。所

谓“史学”，系指征引史料范围的宽窄和历史知识的多寡。所谓“史识”系指分析历史事件、评价历史人物的见解和态度。刘知几一贯反对“虚美”和“讳饰”，而主张从实际（即可靠史料）出发，秉笔直书，所以他说的“史识”中也就包含了对“史德”的要求。的确，史科学作为一门探究事实真理的学问，不仅对研究者提出了才学方面的要求，而且更提出了人格素质方面的要求。比如清代常熟学者吴卓信，著有《三国志补志》《汉书地理志补》等书，他是变卖了全部财产买书，才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明诗综》的编者朱彝尊，为治学而不惜丢官。可以说，淡泊名利就是他成功的起点。作为成功的史料研究者，还必须具有求实的精神、探索的精神、尊师重教的精神，等等。在物欲横流、人心浮躁的当下，上述精神都应该成为史料研究者的道德规范和人格追求。

众所周知，文学史料不但是文学和史学的交融，理论性与应用性的交融，传统研究方法与现代信息手段的交融，而且跟考古学、文字学、音韵学、铭刻学等学科有着密切关联，因而具有极强的综合性，这就向史料研究者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完全可以乐观地预言，文学史科学又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即将到来。这部论文集的学者，有的擅长于研究古典文献，有的则长期从事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工作。古典是现代的源头，现代是古典的历史发展。让我们相互切磋，取长补短，在这门学科的发展史上谱写出新的一页。

（作者单位：北京鲁迅博物馆 北京 100034）

目 录

引言	陈漱渝(1)
世纪之交的文学史料研究	跃 进(1)
出土文物资料与古代文学研究	郑杰文(5)
视野与开拓:先秦文学史研究的三个新思路	郭 丹(20)
略论楚辞研究史料在楚辞学中的作用和地位	毛 庆(25)
从《左传》与《史记》称《诗》的对比研究看《毛序》的作期 ——兼论文学史料应用中的几个问题	王洲明(31)
《汉书·艺文志·诗赋略》前三种分类遗意新说	李士彪(45)
《巾舞歌诗》等五篇考论	徐振贵(51)
“裨官”说考辨	陈 洪(79)
“别集”考源	陈冠明(95)
试论张衡辞赋与汉代隐逸文化	张骏翥(107)
王肃著述摭录	郝桂敏(116)
吐鲁番《文选·七命》残卷考	罗国威(137)
谢庄年谱	陈 庆(143)
《鍾氏族谱》中的五篇唐代制书	谢文学(153)
《玉台新咏》的编者及编撰时间考辨 ——兼与章培恒先生商榷	周绍恒(162)
从《广绝交论》到《葛衣记》	李 芳(180)
百年爬梳 百年开掘 ——敦煌《王梵志诗集》由流散域外到辑集研究回眸	齐文榜(186)
论墓志铭变格破体的文学现象 ——从《唐薛元超墓志铭》谈起	李 慧(201)

韩愈集本文献研究世纪回眸	刘真伦(213)
张祜与元白诗派的离合	陈才智(231)
孙光宪与《金溪闲谈》	房 锐(248)
宋诗话基础研究中的误作现象举正提要	邓国军 王发国(259)
《乐府诗集》“相和歌辞”题解释读	杨 明(278)
《刘知远诸宫调》作期考	武润婷(292)
《续资治通鉴长编》重印点校本校勘献疑	马玉臣(298)
冯镇峦、但明伦等对《聊斋志异》思想内容的评点	张稔穰(318)
上海图书馆藏郑文焯手批《陶渊明全集》真迹本	周兴陆(325)
从学术发展看清代今文学的兴起	罗军凤(334)
帝京远去,亲友梦中	
——论五四作家散文的“帝京情结”	赖 佳(345)
夔文化及宜宾夔文化资源刍议	骆为荣(356)
西南联大南湖诗社	李光荣(361)
谈笑有鸿儒	
——关于马华老作家温梓川的文坛回忆录	钦 鸿(373)
林徽因传记述评	陈学勇(380)
编后记	(392)

世纪之交的文学史料研究

跃 进

现代意义上的文学研究已经走过一百年的历程。一百年间的风云变幻,一百年间的波澜激荡,让人不时会有眼花缭乱的感觉。但是,无论怎样变化,基本史料的收集、整理与研究却始终为学术界所重视,不会因为时代的变迁、文学观念的更新而跌宕起伏。文学史料具有的不可或替的独特价值,在这里得到集中体现。

20 世纪的文学研究首先就是从资料工作起步的。譬如刘师培的《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系统地辑出当时所能看到的绝大多数的原始材料,排比考订,细心辨析,基本上勾勒出汉魏六朝文学发展的概貌。几乎同时,鲁迅亦致力于古代文学史料的钩沉整理,如《古小说钩沉》、《唐宋传奇集》、《小说旧闻钞》、《会稽郡故书杂集》等,可以看出鲁迅先生对于整理我国古代文化遗产的重视和所取得的成就。^①

30 年代,随着新文学第一个十年的过去,具有新锐眼光的出版家赵家璧先生组织文学艺术界的同仁编纂出版《中国新文学大系》,对“五四”文学革命至 1927 年期间的“新文学理论的发生、宣传、争执,以及小说、散文、诗、戏剧诸方面所尝试得来的成绩”,作了“整理、保存、评价”。^②

新中国成立以后,学术界、出版界通力合作,在中国文学的资料整理研究方面作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即以我所在的工作单位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而言,建所之初,文学所就确定了这样的总的工作方针,即:“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观点,对中国和外国从古代到现代的文学的发展及其主要作家主要作品进行有步骤有重点的研

① 鲁迅辑录古籍丛编. 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

② 中国新文学大系. 上海良友图书出版印刷公司,1935. 1936. 赵家璧作前言,全书分为十集:
1. 建设理论集. 2. 文学论争集. 3. 小说一集. 4. 小说二集. 5. 小说三集. 6. 散文一集. 7. 散文二集. 8. 诗集. 9. 戏剧集. 10. 史料·索引。

究、整理和介绍”。这里所说的“研究、整理和介绍”，实际包括了文学研究、史料整理以及普及工作这三个方面的内容。关于文学研究和文学普及工作，我在《尔来倏忽五十年——文学研究所半个世纪的发展历程》一文中作了系统的介绍。^①限于篇幅，有关文学所在史料整理方面的工作语焉不详，容易给人造成一种错觉，以为文学研究所强调理论而忽略史料。事实当然不是如此。史料的收集与整理工作，历来为文学研究所高度重视，被视为建所之本。1960年初，周扬同志到文学所考察工作，明确提出“研究所要大搞资料，文学所要有从古到今最完备的资料”。1965年，周扬同志再次就文学所的研究工作重心问题提出建议，强调搞“大中型”的研究项目，认为这是关系“文学所的存在”的问题。

从事“大中型”项目，图书资料建设是基础。为此，文学研究所专门成立了“图书管理委员会”，负责人是钱锺书，成员有汪蔚林、范宁、吴晓铃等几位专家，协商采购、进书、编目、典藏等事宜。迄今为止，文学研究所图书馆藏书45万册，古籍特藏、现代善本以及5000余册剪报构成了文学研究所资料建设的主体。从古籍特藏看，到“文革”前夕，文学研究所古籍藏书以宋元刊本、明清小说和清代诗文集以及弹词、宝卷等为四大亮点。如宋刊本《资治通鉴纲目》、《通鉴纪事本末》，元刊本《古乐府》等，可谓镇馆之宝。此外，周曰校勘初刻本《三国志传通俗演义》、程甲本《红楼梦》以及《镇海春秋》、《五更风》、《闪电窗》等明清小说均为海内孤本。至于弹词宝卷，更是多达600余种，国内外收藏似无有出其右者。所谓“现代善本”，主要是指1949年以前出版的图书、报纸。历经战乱和政治运动以及书报自身的风化剥落，很多书报已经失传。周作人著作的早期版本，俞平伯20年代的著作，郑振铎编印的《中国版画史》以及闻一多的佚著《古瓦集》等，均已成为海内外稀见珍本。至于报刊剪报，更应特别叙及。文学研究所资料室从1950年以来的百余种报刊中，挑选重要论文，按文学专题和作家作品分类剪贴，迄今已积累报刊资料5000余册，为研究工作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条件。

正是依托着这些资料，文学研究所先后组织编纂了许多大型文学史料丛书。举其要者，如1954年郑振铎召集吴晓铃、赵万里、傅惜华等人主编影印《古本戏曲丛刊》，到1964年已经出版九集。1982年，在文学研究所主持下，重建编辑委员会，继续开展

^① 人民政协报，2003年（9月30日）：“学术家园”版

辑印工作。这套丛刊汇集了我古代戏曲之珍本和孤本,极大地方便了戏曲工作研究者。从70年代末叶到80年代中期,文学研究所先后发起组织编辑了《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中国近代文学研究资料丛书》《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以及《古本小说丛刊》等大型文学选本及资料汇编。此外,还系统编纂了《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论文索引》《中国近代文学研究资料篇目索引》,创办了《中国文学研究年鉴》^①等等,为学术界提供了丰富的研究资料,赢得了海内外学术界的高度赞誉。

再从出版界的角度看,50年来,由各地出版社,特别是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等为龙头,先后组织编纂了许多大型的文学总集、工具书及资料汇编。就以我比较熟悉的古代文学研究界而言,陆续整理、影印出版的《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全唐诗》《全唐诗补编》《全唐文》《全唐文补编》《全宋诗》《全宋文》《全元文》《全唐五代词》《全宋词》《全金元词》《全清词》《全元散曲》《全明散曲》及《文选》《文苑英华》《俄藏敦煌文献》《法藏敦煌西域文献》《英藏敦煌文献》等大型研究资料汇集,已经或陆续问世,蜚声海内外。在此基础上,系统地整理历代文学典籍,业已成为新时期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譬如中华书局《新编诸子集成》《中国佛教典籍选刊》《道教典籍选刊》《古小说丛刊》《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十三经清人注疏》等。上海古籍出版社《宋蜀刻本唐人集丛刊》《山川风物丛书》《四库类书丛刊》《四库文学总集选刊》《四库笔记小说丛书》《四库别集选刊》《清人别集丛刊》《中国古典文学丛书》等。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新注古代文学名家集》《中国小说史料丛书》等。浙江古籍出版社《两浙作家文丛》等。中州古籍出版社《中州名家集》等,有些虽然不能说全是文学典籍,但是与中国文学研究密切相关。与此同时,工具书的编撰工作也得到了广大文学研究者的重视。中华书局《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已经出版了十余种,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楚辞书目五种》《楚辞书目五种续编》受到学者的欢迎。其实有些工具书是非常有价值的研究专著,比如李剑国的《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万曼的《唐集叙录》,张舜徽的《清人文集别录》《清人笔记条辨》,袁行云的《清代诗集叙录》等具有相当高的学术价值,为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提供了丰富全面的资料,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深入发展。

^① 1990年改为《中国文学年鉴》,增加创作部分。

从事文学史料研究,虽然卑之无甚高论,但我相信,任何一个文学研究工作者,尽管他所研究的对象不尽相同,但无疑都会或多或少地受益于上述各类经过认真系统整理过的文学史料。如果要想把我们的文学研究事业推向更高境界,不用说,史料是基础。这几乎是一种常识,但是常识性的东西,往往为人们所忽略。中华文学史料学会自1989年成立以来,就一直致力于这种常识性观念的宣传工作。随着学术研究的深入和学术环境的变化,史料工作已经日益引起学术界的重视。我个人觉得应当在下列四个方面多做一些工作:第一,拓宽疆域,扩大队伍。原始资料的汇集、研究成果的整理、海外华人文学的资料、域外汉籍的清点等,都应当列入我们的研究日程;第二,加强联系,扩大宣传。文学史料涉及文学研究的方方面面。我们应当加强与相关业务部门及各个专业协会的联系;第三,推动立项,争取资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每年上亿元,中国社会科学院每年也几千万。但是,在指导性的研究课题方面,可以说没有文学史料的一席之地。似乎重大课题往往都是那些高屋建瓴的通论著作。其实,《甲骨文合集》等又何尝不是重大项目?第四,自身建设,立足之本。这里应当强调文学史料整理的系统化、科学化和理论化。所谓系统化,就是注重大型史料库的建立。所谓科学化,就是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手段从事文学史料的整理。这方面,我国的台湾省、香港特别行政区有着比较成功的尝试。譬如台湾“中央研究院”早在1984年就率先设立研究小组,先后创立多种文献资料库,包括《二十五史》全文资料库、简帛金石资料库、《十三经注疏》资料库等。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建立《先秦两汉一切传世文献全文资料库》,收录103部典籍,共约800万字。他们还编制《魏晋南北朝一切传世文献全文资料库》,现已经出版多种。这些资料,国外学者及时充分地加以利用,取得了事半功倍的功效。当然,中国社会科学院早在1987年也陆续建立起全文检索资料库,整理了《全唐诗》《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十三经注疏》《诸子集成》《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宋词》等资料,可惜这些资料大多养在深闺,并没有受到广大研究工作者的充分重视,更不要说有效地利用了。

一百年的经验教训,一百年的辛勤探索,人们对于史料的意义和价值的认识,已经有了较大的改变。值此世纪之交,我们有理由期待着文学史料学研究能有更大的发展。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北京 100073)

出土文物资料与古代文学研究

郑杰文

出土实物资料与出土文字图画资料,本文统称出土文物资料。此类材料在文史研究中的作用,王国维先生于清华研究院讲《古史新证》时,在第一章《总论》中说:“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材料之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训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①

以“地下之新材料”补正或补充“纸上之材料”,于古代文学研究尤其是资料相对缺乏的先秦两汉文学研究,有重要意义和重大作用。以下仅就出土文物资料对考证“纸上之材料”的时代坐标作用和对于“纸上之材料”的补充空白作用进行说明。

一、出土文物资料对传世文献之作时确定中的时代坐标作用

在先秦历史散文和两汉史传文学构成的先秦两汉散体文学的研究中,由《左传》等先秦散体文“以记事为主”发展到《史记》等两汉散体文“以写人为要”,缺乏对中间发展环节的研究。而这一发展链环之研究缺失的主要原因,在于缺乏写作时间确定的研究对象。借助出土文物资料为时代坐标,我们可考定《战国策》所收战国策文的写作年代,补充此一先秦两汉散体文学发展环节的研究资料,对先秦散体文“以记事为主”到两汉散体文“以写人为要”的发展变化过程作深入研究。

1973年,出土于长沙马王堆汉墓的帛书中有27篇与《战国策》性质相近的文章,整理者定名为《战国纵横家书》。这些文章特别是关于苏秦书信和谈话的文章,唐兰

^① 王国维:《王国维文集》,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

先生考证认为“几乎可以说是当时的第一手资料”。^①以这批资料为时代坐标,可考证传世文献《战国策》的写作年代,从而为研究先秦散体文“以记事为主”到两汉散体文“以写人为要”的发展变化过程提供一种可靠的研究对象。

合纵连横运动中产生了许多策士说辞,也流传着许多策士游说活动的记录。这些策士说辞和策士行事录中的一部分,曾被司马迁作为研究战国史的可靠资料收入《史记》中,后被刘向编定的《战国策》保存下来。《史记》载录的这类原始资料和《战国策》保存的这类材料的真实程度有多大,即它们是否保持着较早著录之文字的原貌,也就是说它们是否是战国时的“原作”,需要进行考察比证。被学界考定为“当时的第一手资料”的《战国纵横家书》,是考察比证《史记》载录的这类原始资料和《战国策》保存的这类材料的真实程度的标尺。

为了进行考察比证,我们先选取《战国策·赵策一》、《战国纵横家书》、《史记·赵世家》中各保存下来的同一篇策士说辞来作一番比较:

《战国策》《战国纵横家书》《史记》录苏秦说赵王辞对照表

《战国策》 ^②	《战国纵横家书》 ^③	《史记》
臣闻古之贤君,德行非施于海内也,教顺慈爱非布于万民也,祭祀时享非当于鬼神也。	臣闻	臣闻古之贤君,其德行非布于海内也,教顺非洽于民人也,祭祀时享非数常于鬼神也。
甘露降,风雨时至,农夫登,年谷丰盈,众人喜之而贤主恶之。今足下功力非数痛加于秦国,而怨毒积恶非曾深凌于韩也。	[甘]露降,时雨至,禾谷丰盈,众人喜之,贤君恶之。今足下功力非数加于秦也,怨毒积怒非深于齐,下吏皆以秦为忧赵而憎齐。	甘露降,时雨至,年谷丰孰,民不疾疫,众人善之,然而贤主图之。

① 唐兰:司马迁没有见过的珍贵史料,《战国纵横家书》,北京:文物出版社,1976年,128

② 诸祖耿:《战国策集注汇考》,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自此以下所引《战国策》之分章、章名、文字等皆据此书。

③ 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战国纵横家书》,文物出版社,1976。以下所引《战国纵横家书》皆据此版本,唯古字改用今字,借字改为本字。

续表

《战国策》	《战国纵横家书》	《史记》
臣窃外闻大臣及下吏之议,皆言主前专据以秦为爱赵而憎韩。臣窃以事观之,秦岂得爱赵而憎韩哉?欲亡韩、吞两周之地,故以韩为饵,先出声于天下,欲邻国闻而观之也。	臣窃以事观之,秦岂忧赵而憎齐哉?欲以亡韩、吞两周,故以齐饵天下。	今足下之贤行功力非数加于秦也,怨毒积怒非素深于齐也。秦赵与国,以强征兵于韩,秦诚爱赵乎?其实憎齐乎?物之甚者,贤主察之。秦非爱赵而憎齐也,欲亡韩而吞两周,故以齐饵天下。
恐其事不成,故出兵以佯示赵、魏;恐天下之惊觉,故微韩以貳之;恐天下疑己,故出质以为信。声德于与国,而实伐空韩。臣窃观其图之也,议秦以谋计必出于是。	恐事之不○成,故出兵以割革赵、魏;恐天下疑己,故出质以为信;声德与国,实伐郑韩。[臣]以秦之计必出于此。	恐事之不合,故出兵以劫魏、赵;恐天下畏己也,故出质以为信;恐天下亟反也,故征兵于韩以威之。声以德与国,实而伐空韩,臣以秦计为必出于此。
且夫说士之计,皆曰:“韩亡三川,魏灭晋国,恃韩未穷而祸及于赵。”	且说士之计皆曰:“韩亡三川,魏亡晋国,市○○朝未罢祸及于赵。”	夫物固有势异而患同者,楚久伐而中山亡,今齐久伐而韩必亡。破齐,王与六国分其利也。亡韩,秦独擅之。收两周,西取祭器,秦独私之。
且物固有势异而患同者,又有势同而患异者。昔楚人久伐而中山亡。	且物固[有势]异而患同者。昔者楚久伐,中山亡。	赋田计功,王之获利孰与秦多?说士之计曰:“韩亡三川,魏亡晋国,市朝未变而祸已及矣。”
今燕尽韩之河南,距沙丘而至钜鹿之界三百里,距于扞关至于榆中千五百里。秦尽韩、魏之上党,则地与国都邦属而壤拑者七百里。秦以三军强弩坐羊膺之上,即地去邯郸二十里。且秦以三军攻	今燕尽齐之河南,距沙丘、钜鹿之圉三百里。距秦关,北至于[榆中]者千五百里。秦尽韩魏之上党,则地与王布属壤芥者七百里,秦以强弩坐羊膺之道,则地去邯郸廿里。秦以三军攻王之上	燕尽齐之北地,去沙丘、钜鹿,斂三百里,韩之上党去邯郸百里;燕、秦谋王之河山,间三百里而通矣;